

告 讀 者

亲爱的讀者：

今天，我們生活在新中国是多么幸福啊！这儿沒有剝削、沒有压迫，人們都在不同的崗位上，為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辛勤地劳动着。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到过：解放前的旧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那时候，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怎样过着悽惨的生活呢？这些，对于生长在新中国的广大青年來說，都是比較陌生的；即使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人，有的也許漸漸淡忘了吧！

俗話說：知道黃連苦，更知蜜儿甜。只有認清了資本主义制度的丑恶，才能更加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对旧社会有着刻骨的仇恨，才能对新社会有无比的热爱。为了帮助大家了解旧社会的黑暗，更加热爱新社会，我們打算編輯出版一套工农家史小丛书，作为自我教育的材料。如有不妥的地方，希望同志們提出意見，以便改进。

編 著

1963年10月

血淚斑斑話當年

蚌埠市東海煙廠老工人 王云芝

我家現在有七口人。我在廠里做工，兩個大孩子在上學，妻子管家務和照顧三個小孩子。家里不愁吃，不愁穿，日子過得挺熱火。每当我想到現在這七口人幸福生活的時候，就不由得引起對過去七口人痛苦生活的回憶：破產逃荒、當牛做馬、挨打受罵、父死兄亡、母子離散……，就象從電影里看到的廣告片，一幅一幅地出現在我的面前。

逃出火坑 又入苦海

我的老家住在渦陽縣花沟集。四十年前，我家也是七口人：父親，母親，三個哥哥，我，還有一個三歲就死去娘的小侄兒。我六歲那年，父親看家里只有三亩老坟地，養活不了這七張嘴，心想：孩子們一個個長大了，能干活，只要有地種，就能有碗飯吃，於是東求情，西哀告，從地主孫萬財家租來一份地。租子按照定產倒三七，不管田地收不收，都給地主送七

成糧。哪知那些年年成不好，不是旱就是澇，不是澇就是旱。头一年闹水灾，打下的粮食，全部交了地租，还欠下十五斗秫秫。孙万财看实在逼不出来，就对父亲說：“这十五斗秫秫，折合十五斗小麦借給你，一斗加五升，来年午季还麦吧！”第二年又是个大旱年，平地冒青烟，全家人起五更睡半夜，用血和汗换来的一点粮食，也只勉强够繳新租。孙万财看地再讓我們种下去，陈債接新債，沒法还清了，等我家把午季种好，就把地抽了回去。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父亲看沒了地种，就和全家人抱头痛哭起来。哭声还没有停止，孙万财又带着狗腿子来逼債。他冲进门就对父亲說：“王老头，你地不种了，債該还了！”这句话，又象一把鋼刀刺进了父亲的心窝。他噙着眼泪哀求說：“老爷，你看我这一大窩孩子，眼下就揭不开鍋，哪里还有粮食还債呀？”狠心的地主一听，瞪着两只吃人似的大眼睛，狂吼起来：“不行！沒粮食就抵押东西。”就这样，我家的一切，包括三亩老坟地，都落到了地主的手里。没办法，父亲只好带着母亲和我們，离开祖祖代代居住的家乡，走上成年累月逃荒要飯的道路。

天下烏鵲一般黑，到处地主一样狠。我們逃出了火坑，又入了苦海。开始，逃到涡阳南边崗子集，那

里地主不准立足，只好脚跟脚地又朝前走。經過几天，逃到蒙城地界，商得一家姓徐的中农破車棚暫住，沒想到剛住几天又飞來了一場大禍。

一天早上，天還沒有大亮，父親起床向棚外一看，發現十几捆秫稈。他想：“外財不發命穷人”，一夜之間哪里飛來這些秫稈？這裏面恐怕有鬼，趕忙去向房東家報告。未等他回來，一個凶神帶着三、四個狗腿子已罵到棚前。他指着我母親的鼻子說：“你們這些窮骨头，真是吃老虎的胆子，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偷到我的門上！”母親抖動着嘴唇說：“我們……是……逃荒戶，哪敢……”“胡說，臭娘們，你們未偷，難道我的秫稈長腿了嗎？”說着，那個惡棍就去逼房東家把我們擰走。正当父親端起鍋準備走的時候，一個胖得象肥豬樣的人站在我們面前，說：“花子們，沒地方住嗎？就搬到我門上去住吧。許家房子有的是。”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是地主許寒章的圈套。他看我家有好几个劳动力，是他剝削的對象，就叫狗腿子夜裡搬些秫稈扔到我家屋外，作為借口，逼着徐家房東把我們趕走，好去他家替他當牛做馬。起先來罵我們的是許寒章的三兒子。最後來的是許寒章自己。這許寒章是蒙城縣有名的惡霸，走官府，跑衙門，方圓百里，無人不曉。被他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

家是數不清的。父親聽他这么一說，明知是黃鼠狼給鶴拜年——沒安好心，但怕得罪他，要惹禍，一时拿不定主意。二哥却堅持要走，他說：“你們不走，我走！好歹抱一根討飯棍，餓死就算命短！”老狐狸看誘騙不成，就撕下假面具，露出吃人的凶相，冷冷地笑着說：“方圓几十里，田埂都姓許，我看哪個小子敢走動一步！”說着，夾着尾巴就走了。父親想着“好漢不吃眼前亏”，就勸哥哥們留下了。

來到許家後，血和泪的生活又開始了。地主一股勁地叫我們做苦工：父親和哥哥每天天不亮就被逼着下地干活。母親沒昼夜地要給他們洗衣、做飯。我那时還不滿十歲，個子又矮小，連地主的高門檻還跨不過——要是在今天正是上學的時候——但每天放過牛以後，還要給他們挑水、扫地，做雜活。一次水缸沒有灌滿，就要吃鞭子。母親有時在廚房里，看我那麼小，服侍两只那麼大的水桶，身子被壓的象個陀子，心里難过得淚水直往肚里流。

我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給地主賣命，但是，從來不見他們一文工錢。原來就不願留下的二哥，更想走了。許寒章看出這個苗頭，施下一個鬼計。

一天早上，他把父親叫到面前說道：“我許家仁義，从不亏待別人，我看你們干活不錯，我那二亩园

地，就讓你們擺置吧。不過，我家吃菜，你們得包下來，多余的賣錢要一家一半……”父親聽說有个“一家一半”，頓時高興起來。沒想到這“一家一半”，不是添了福，而是多了一重累，我們為了這個“一家一半”，就拼命在園地上施肥、澆水、除草、捉蟲……。但是，結果怎樣呢？收少了，一次供不上地主嘴，他就惡狠狠地罵到門上。多收了，地主三親六眷多，七送八送，未等賣到“一家一半”，已送個淨光。我們辛辛苦苦地忙了多少日，結果還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我們成年累月地為許家當牛做馬，不見一文錢，這還不算，而且還要經常挨打挨罵。有一次，許寒章的眼鏡，被他小孫子玩掉了鏡片，扔到沟里。他硬誣賴是我們兄弟偷的，把二哥、三哥和我一齊吊在馬棚的橫梁上，打一棍問一句：“哪個小兔



崽子偷了我的眼鏡，再不說我就打死你們！”我們沒有偷，當然不承認，他就一股勁地打，打得我們头上、臉上、身上全是血。这时快要过年了。母亲在磨房里給地主磨面蒸饅头祭祖。开始，她听到我們的哭叫声，也未注意。因为挨許家地主打罵是家常便飯，不仅是我們，連她自己也是常有的事。后来，她听我們哭叫得特別慘，便慌慌忙忙地从磨房里跑出來。一看，我們滿臉滿身都是血，她忙着跪下來向地主哀求說：“老爺，你打我吧，不要再打他們了……”但是，許寒章就象沒有看見，他还是不住手地打。直打得我們死去活來，他自己也打累了，方才罢休。

父死兄亡 母子离散

慘遭許寒章这頓毒打以后，二哥便跑到外边去卖散工，用繩子也拴不住他了。地主看二哥不为他卖命，怀恨在心，大肆造謠說二哥是“瘋子”，是“小偷”，叫別人不要他干活，东西少了都去找他。这种阴谋未能得逞，許寒章就决定对二哥下毒手了。一天，許寒章把父亲叫去对他說：“王老头，你二儿子瘋了，到处偷人，你去打副腳鐸把他砸起来吧！”父亲听到这种誣蔑，怒火直冒，心里就象刀絞，但全家人的性命都落在地主的手里，又不敢当面頂撞，只好忍气吞声地

說：“老爷，我家就象大水洗过一样，哪來錢打脚鐐呀？”地主沒办法，只好自己拿錢打副脚鐐，将二哥騙回来，就象对待犯人一样，把他砸起来了。二哥失去行走自由以后，全家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母亲眼泪都淌干了。但是，在那样吃人的社会里，一个穷苦的逃荒要飯人家，对一个有錢有勢的恶霸地主又有什麼办法呢？村子上人見到这个情况，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最后，还是一个外来的逃荒戶孙为学，冒着生命危險，用斧头把二哥脚鐐砸开，放他逃跑了。从此，二哥就一直沒有音信，是死是活也就无法知道了。

从地主給二哥上鐐那天起，大哥一气就病倒了。由于天天躺在潮湿的地土上，盖沒有盖，吃沒有吃，挨冻受餓，病势就一天天加重了，白天黑夜都叫个不停，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母亲看到大哥的身体好象灯里的油快熬干了，明知地主是石头心腸，还是硬着头皮去向許寒章求药給他吃。許寒章，在蒙城街上开有两个药店，自己也会行医。他听说母亲去向他求药，就恶狠狠地说：“你儿子裝病，不給我干活，还想糟蹋我的药呢，給我滾！”說着，就把母亲赶了回来。母亲沒有求到药，还受了一肚子气，两只眼睛哭肿的象个紅柿子。仅仅剩下一口气的大哥，知道这个情况后，病上加病，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我大哥就是这样飲恨

而死的。

大哥死后不久，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轟炸蒙城。許寒章怕街上药店东西受損失，就逼着父亲和另外两个长工套牛車上街搬貨。临走时交代，牛不准进城，要人把东西一件一件往城外搬。有一次，父亲和另外两个长工剛进药店，日本飞机来了。沒有办法，他們只好往药店后面地洞里鑽，父亲的腿剛伸下去，一枚炸弹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炸开了，濺他滿臉滿身都是人血和泥土。他从昏迷状态中醒来一看，后面一个长工被炸的只剩下半截身子。这时，他被吓得象块木头，半天也不敢动一动。

这一吓，父亲回来就病了。半夜做梦还叫着“跑呀！飞机……”

但是，狠心的地主哪管穷人死活？你只要有一口气，就得为他卖命。一天，許寒章要跑反，硬逼父亲給他搬东西，母亲跪下哀求說：“老爷，喜子（我的小名）爸的病还没好，你就积些阴德吧……”許寒章一听，咆哮起来：“他不搬，我的东西怎么办！”說着，就指揮狗腿子把父亲从病鋪上拖起来，叫他扛起一个百来斤重的大箱子，送他去逃命。

过不多久，有人捎信來說，父亲連病带累在路上被折磨死了。可怜的父亲为地主卖了一辈子命，最

后还被地主害得落个尸骨都沒有归家。

父亲死后，禍事又一个接着一个而来。

一天中午，三哥正在地里給許家鋤秫秫，冷不防被一羣伪乡丁圍住。他們把他踢倒在地，捆的捆，綁的綁，拖拖扯扯地把他拉走了。当时，母亲和我还被蒙在鼓里，事后才听人說是許寒章回来把他卖了壮丁。

三哥被抓去不久，一天，庄子上一个穷木匠（名字記不清了）又連夜送信給母亲：“你家喜子也被許寒章卖了壮丁，明早就要来抓人！”母亲吓呆了，半天不說一句話。我看她吓得那个样子，就一头扎进她的怀里，說：“娘，你讓我走吧，只要有条命，以后还能見面。”母亲搖摇头，說：“喜子，我們从老家逃荒来的是七口人，如今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只剩下三代三个人，你要再走，叫我怎么过？！現在怎么也不能讓你离开我，死也死在一块……”說着，她就嗚嗚咽咽地哭泣起来。后来，左劝右劝，好不容易才說服她讓我暂时离开。我走时，她把我送四、五里路。我离开她很远，她还在那里呆望着。

前面走狼 后面来虎

我从蒙城乡下逃到蚌埠以后，一无亲，二无故，整天过着流浪生活。开始，住在西崗大王庙后面的破

窖里，天天割草卖給倪公祠附近的一家牛奶厂，每卖一百斤，給頓稀飯錢，但累死累活都填不飽肚子。后来，听说新船塘边一家煤炭厂招工抬炭，給錢給住，我就投奔去了。不料这是日本鬼子开的炭厂。这个炭厂又是人間地獄，埋人的火坑。住的是猪棚不如的破草屋，进去要低着头，弯着腰，一下大雨，里面就成河。夏天，屋里象蒸籠，霉湿气味又重，簡直叫你透不过气来，只好在露天底下睡觉；冬天，屋里象冰窖，床沒床，被沒被，冷得没有办法，只好和許多工人挤在一起，互相沾沾热气。就这样，一天也休息不了几个小时，每天鶴叫头遍，就被工头用鞭子敲起来赶上工，一直干到天黑才准回来。一天工錢，連两頓稀飯也喝不上，当然更談不上穿衣，我寒冬腊月天只能穿上逃荒时带来的一条破褲头。这还不算，更难受的是：每天都要过几道鬼門关。进厂要搜身，要給站崗的鬼子行礼，稍一疏忽，就要挨打，甚至要吃刺刀。日本鬼子把我們簡直不当人。他們杀死一个中国人，只当他走路踩死一个螞蟻。有一次，两个鬼子看一个抬炭工人不順眼，便把他拖到炭場后院水塘边，死勁地灌涼水，等把他肚子灌鼓起来，就一个抬头，一个抬脚，一股勁地朝洋灰地上摔，結果活活把他摔死。这在日本鬼子的炭厂里，只不过是一个例子，类似这样的事

情經常发生。有一次，我也差点儿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送掉性命。那是一个冰天雪地的早上，我和一个工人抬着一筐二百多斤重的煤炭，由于又冻又累，我們的腰直不起来，脚步走慢了点，被监工的日本兵看到了，他哇啦哇啦地叫着：“苦力，你的偷懶，良心大大坏了的……”說着，拔出“东洋刀”，直往我們身上砍。幸而我們跑的快，当时人又多，才躲过了一死。那时，我們每次上工都提心吊胆，只有晚上回到工棚里才敢說：“今天我又活过来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炭厂关了門，我結束了在日本鬼子鐵蹄下的三年牛馬生活，到宝兴面粉厂去推炭。这宝兴面粉厂，是中国官僚資本家楊三从日本鬼子手里接收过来的。当时我想：日本鬼子走了，中国人对中国人总要好一些。哪知“前面走狼，后面来虎”，中国官僚資本家和日本鬼子对工人沒有两样。这是我万万沒有想到的。

我在宝兴面粉厂推炭車，这哪是人干的活呀？！三个大炉子輪流退火，資本家为了多賺錢，逼我們在炭火熊熊的时候，就把它裝車推走。那时，沒有手套，沒有防火面具。車子是鐵打的，手掌是肉的，肉烙上了火燙的鐵，哪能吃得消？皮一层层地掉，肉牙鮮紅鮮紅地現出来，火辣辣地一直痛到心里。这还不算，

裝在車箱里的那些未燒透的煤，經常伸着长长的火舌，冒出一股股烈性的濃烟，嗆得我直打咳嗽，眼泪、鼻涕直往外流，烤得連眉毛、汗毛都沒有了。那时干活，背后还跟着鞭子。有一次，我被烤的头昏，車子推到风涼的地方停了一下，哪知剛歇倒，就碰到楊三。他看我車子在那儿沒动，便举起手里的“文明棍”劈头蓋臉地打下来，接着又是两脚边踢边說：“他媽的，你不去給我干活，站在这儿干什么？！”这一打，才使我醒悟到，資本家都一样的黑心腸，我們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呢！

过了些时候，远在蒙城乡下的母亲，从一个跑生意人的口里，打听到我的下落，就討飯來到了蚌埠。实指望見到我后，可以过几天好日子，沒想到这原来是一場梦。

我的工錢原来規定是用面粉支付的，后来国民党的鈔票贬值，物价天天飞漲，資本家为了从中牟利，在发工資以前，就尽量压低面粉牌价，但是一袋不卖，只是按低价折錢发給工人工資，等到工資一发完，面价立刻回升，一直提高到工人領一袋面錢买不到半袋子面的时候，才开门售面。这样，我的工錢原来算着可以維持一个月生活，結果半个月也維持不到。母亲只好拿起討飯棍到街上要飯。

我二十五岁那年，經一位工友介紹，和一个穷人家的女儿結了婚。妻子开始在蚌埠大来烟厂包烟。那时厂里資本家对女工規定“三不要”：怀孕的不要，有奶孩子的不要，年紀大的不要。一年后，我的第一个小孩还未落地，妻子就被开除了。母亲看我們生活无着落，一天她把我拉到身边对我說：“喜子，我不在这里連累你，免得大家都活不下去……”說着，她把我抱在怀里大哭起来。不久，她就拿起带来的那根討飯棍去了乡下。未过半年，就听说她連病帶餓死了。

撥开雲霧 見到太阳

一九四九年春，蚌埠解放了。九死一生的我，被从地獄里救了出来，見到了太阳。

不过，在初解放的那些日子，我的思想还是动荡不安的。几十年的生活經歷，从孙家虎口到許家狼窩，从鬼子的洋刀到楊三的棍子，巴来望去，都沒有逃出火坑，跳出苦海，這使我对一切都不敢再抱有什么希望。因此，每次上班、下班，干活、吃飯，我都留意着周圍发生的事情，看看到底起了些什么变化。

一天夜班开飯，过去騎在工人头上的工头，仍然按照“老規矩”，叫我們吃他剩下的饭菜。我气不过，和他吵了起来。但吵过以后，心里就象十五吊桶打水

——七上八下。我清楚地記得，解放前几天，有一个和我同上夜班的青年工人，也是因为吃夜班飯，和工头頂了句把嘴，第二天这个工人就被开除了。我心想：明天是否也要开除我？真是开除了，我又到哪儿去？越想越担心。夜里下班回来，我就打起包袱准备被开除。第二天早上，沒有人提开除我的事，但我心里还是拴个大疙瘩。于是，便去找剛由工人提拔当車間主任的戴金恆談談自己的思想。沒想到戴金恆对我說：“老王啊，現在的天下是咱們的了，你还怕誰呢？”这时，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才放下了。以后，我又亲眼看到党派到厂里的葛代表、工会李主席，都穿着粗布衣裳，經常和我們在一起談心，告訴我們“当家做主”的道理。从此，我才認定共产党是穷苦人的領路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彻底翻身。

从此以后，我的心里平坦了，只要党发出什么号召，我都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时，我捐献三十元买飞机大炮打美国鬼子，有人关心我說：“你一个月只拿这么些錢，捐多了可变得出来！”但我通过节约家用省来的錢，还提前交了款。一九五一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使我进一步觉悟到，應該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以后，我被調到东海烟厂做鍋炉工，党号召节约用煤，我就动脑筋，想点子，先后七次改

进鍋炉，十年来大約为国家节约煤炭一百多万公斤。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烟产量激增，原来的零点七吨鍋炉供汽量不足，我在厂党委和車間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把它改建成两吨的大鍋炉，从而解决了生产上的困难。

这几年来，我在工作中做出了这么一点点成績，党和人民却給了我許許多榮譽，評我当先进生产者、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节约标兵、革新能手等等，还选我为蚌埠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直接参加管理国家大事。这是我过去做梦也沒有想到的啊。

想想过去，看看現在，我要永远記住过去的苦难，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設。

(李晴川、赵文襄整理)

两个母亲

淮南市大通煤矿工人 程廷忠

我有双重父母。我同胞兄弟三个人三个姓：大哥跟生父姓宋，二哥和我跟养父姓王姓程。为什么是这样呢？提起我家的历史，真比黄连苦三分。

(一)

我家原籍安徽宿县，因为遭受灾荒，父亲才拖家带眷逃到蚌埠，我就是在蚌埠出生的。父亲逃到蚌埠后，在窑厂做工，母亲在街上帮人家烧锅做饭、洗衣裳，大哥带着二哥讨饭。我那时很小，母亲帮工时把我揩在身上，因为没有奶吃，我天天饿的直哭，因此，人家都不要她做活了。母亲失了业，全家人只得靠父亲一个人干工养活。父亲干工，拿钱又少，一个月工钱买的粮食，不到半个月就吃光了。没办法，夏季母亲只好带着哥哥挖野菜补贴着吃，冬季母亲就抱着我、带着两个哥哥去讨饭。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父亲生了重病，一病倒就是

几个月不能起床。天天睡在床上，从天亮喊到天黑，从天黑叫到天亮。瘦的皮包骨头不象个人样，只剩下一口气了。厂里老板也不给治疗。母亲急得白天黑夜只是守着父亲哭，眼睛肿的象两个红鸡蛋。左亲右邻都来劝她说：“宋嫂子，你别光哭啦，哭出了好和歹，你这一大窝孩子怎么办？还是想个办法给宋大哥治病要紧……。”

听了亲邻们的劝告，我母亲哭的更厉害了，她泣不成声地说：“家没有家，地没有地，穷的连个打狗棍都没有，叫我想什么办法呢？”

大哥看母亲哭的厉害，他抱着母亲的胳膊说：“娘，你把我卖掉吧，卖点钱好给咱爹治病呀！”大哥的这一句话，象一把锋利的钢刀，刺入母亲的心窝，母亲一把抱住他，哭的话也说不好了。我和二哥也抱着母亲哭，母子四个人，整整的抱头哭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母亲起的特别早。她走到我们身旁，看看大哥，摇摇头叹口气；看看二哥，摇摇头叹口气；然后她又把我抱起来，放下去，左看右看，还是摇摇头叹口气。后来，她把二哥抱走了，回来时，只见她手里提着一包草药，却不见了二哥。原来这药就是卖二哥的钱买的。二哥被卖给了一家姓王的大商人。从此以后，母亲想二哥想疯了，她天天喊叫：“二孩呀！

娘的心狠，把你卖掉了。你想娘嗎？娘想你呀……”
就这样，我母亲哭叫了两年多。

父亲得的是慢性劳伤病，咳嗽吐血，时间长了，他的脊骨炎病也爆发了，仍然不能上工，我們的生活还是沒有一点指望。

夏季，我們还能依靠挖野菜打树叶填填肚子，冬季，就更难熬了，吃沒有吃的，穿沒有穿的，蓋沒有蓋的。无情的大雪，好象要和穷人作对似的，白天黑夜不睜眼地下着。我們不能出門討飯，全家人就睡在稻草窩里哭。左亲右邻看到我們餓的可怜，送点米面給我們吃，可这又能吃几天呢？

母亲看我餓的只剩下一把骨头，难过得眼泪直往肚里淌。一天早晨，她把我紧紧地摟在怀里，撫摸着我的臉，苦笑着对我說：“小三，你想吃燒餅吧？呆一会，娘买燒餅給你吃，你說好嗎？”这样的話，我从来沒听母亲說过，心想：天天稀湯都喝不上嘴，咋能不想吃燒餅呢？想吃又哪來錢买呢？我手摸着母亲的嘴下巴問道：“娘！我家有錢买燒餅嗎？”

母亲听我說想吃燒餅，就把我抱起來說：“你程大爷家有燒餅，走，我帶你到他家吃去。”她說完就把我抱走了。一路上，她不住眼地瞅着我，有时把腮帮紧紧地貼在我的臉上，泪水从她的臉上，又滾到我

的臉上。我雖看不見她的臉了，可是能看見她用衣袖擦眼泪，我心想：母親要買燒餅給我吃，為什麼還要傷心的哭呢？該不會把我也卖掉吧？想到這裡，我就緊緊地摟着她的脖子說：“娘，你別哭我呵，我長大了跟爹學燒窯，掙錢買白饅給你吃！……你喜歡我嗎？”

母親點點頭，她結結巴巴地說：“喜……喜……喜……”她的話沒有說完，咽喉就象塞住什麼說不出来了。她把臉扭過去擦擦眼泪，停了停，又飛快地抱我向程大爺家跑去。

母親把我抱到程大爺家，程大娘真的買了一個燒餅給我吃，我把燒餅吃完，再也找不到母親了。從此，我就成了姓程家的兒子了。

程家大爺和我父親，在一個窯廠里打工。他家沒有小孩，就把我當成了他的親生兒子。後來，聽程家父母說：當時母親怕我餓死，才把我送給程家的。

(二)

一九四二年，我生身父親的病漸漸好了，但他的腰已彎的直不起來，人們都喊他“宋駝鍋子”。他的病還沒有完全好清，就強打着精神去上工。父親能上工了，母親和哥哥也都有了喜色，心想：這一下子該

熬出头了吧，只要有人干工掙錢，就不愁挨餓受凍了。哪知這一綫希望，很快就成了泡影。

父親到了礮廠，老板見他瘦的連骨头帶肉只有一把，腰弯的象個犁梢，就厲聲地說：“宋駝鍋子，你被解僱啦，以後不許再進廠，你家也得從工房搬出去！”說罷，他把一对母狗眼擠了擠，一羣狗腿子就把我父親推出門外。从此，我的生父就失了業，全家人被從工棚里攆了出來。沒辦法，白天父親和母親、哥哥在街頭上討飯，夜晚就在大商店屋簷底下住宿。就这样，也不得安身，日本鬼子的宪兵還時常拉着洋狗攆他們。

日本鬼子投降后的第二年，蚌埠又住滿了国民党的軍隊。他們到處抓壯丁、拉夫子，鬧得鷄犬不安。有錢有勢人家，坐在家里有吃有喝，可是窮人哪能這樣呢？沒辦法，母親還是要帶着大哥冒着危險去討飯。

一天，母親和大哥正在街上討飯，一羣凶惡的国民党軍把他們圍住了，不容分說，兩個強盜把我大哥拉著就走，我母親拚死拚活地扯住大哥胳膊不放，那羣強盜就把她狠狠地毒打了一頓。最後，大哥還是被拉走了。那時候，他還不滿十六歲。晚上，母親整整地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两只眼睛肿的就象燈籠一

样。

大哥被抓壮丁后，父亲看在蚌埠过不下去了，就托人在江南窑厂找了个工做。临走时，母亲送了又送，哭了又哭，直到父亲走了很远很远时，她才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走回来。这时，我家原来的五个人，就剩下母亲一个人了。陪同她的，只有一根打狗棍，一个要饭碗。一年四季，她就挨门挨户地讨饭。

一个秋天的夜里，牛毛细雨下的天昏地暗。我母亲讨饭回来刚刚睡倒，一羣街痞流氓就把她围住了。几支手电筒的光柱，落在她的身上。一个手拿繩子的流氓說：“起来，起来，你丈夫把你卖掉了，跟我們走吧！”我母亲苦苦哀求說：“你們饒饒我吧，我是个苦命讨饭的……”說着，她就呜咽地哭泣起来。

“不准哭叫，叫就打死你！”几个流氓一涌而上，把母亲拖走了。一路上，我母亲喊叫着：“救命呀！救命呀！”可是，在这兵荒馬乱的年头，深更半夜的，誰又敢出来救人呢？

母亲被拉到郊外的一間黑屋子里，整整关了两个多小时，后来，她假装着小解，翻过厕所的墙头，偷偷地逃到了乡下。

父亲讨饭来到江南窑厂做工。那里的老板跟蚌埠窑厂的老板一样狠毒。他看当时兵荒馬乱，国内局势

不好，就扣着工人的工錢不发。我父亲干了两年工，
窑厂邵老板沒发一文錢。

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爆发了。我父亲很耽心母亲的安全，就向老板要工錢，准备回家看看，哪知老板就对他下了毒手。

一天，邵老板帶領几根枪，把工棚包围了，他指着我父亲說：“姓宋的，國軍派你当壯丁，快去吧！”我父亲要和他講理，一圈子刺刀都对着他的心窝，不容分說，就把他带走了。后来，我父亲才知道，他是被老板二百万块錢（伪币）卖掉的。

后来，国民党军队压运壮丁，向淮海战场上送，走到半路上，我父亲乘机开了小差，又跑回江南窑厂，找到姓邵的老板說：“邵老板，你好毒的心呀，你欠我工錢不給，还偷偷地把我卖掉，好吧，我們当着大伙算算賬，你把工錢給我，我走我的路。”我父亲找老板时，带了很多工人去，他們都很同情我父亲。老板一見情况不妙，就滿臉陪笑地說：“好，好，好，我馬上就把工錢給你，你要不放心，明天就跟我一块到江北去取錢。”

我父亲信以为真，第二天真跟他一块去江北取錢。哪知船到江心，姓邵的老板便起了杀人之心，他站起来看看滾滾的江水，又递一根香烟給我父亲，笑眯眯

地說：“老宋，你站起来看看，我們取錢的地方，就是那座小白樓，过了江就到啦，這会你該放心了吧。”我父亲不知道他的用意，就站起来順他手指方向看去，就在这时候，冷不防被他推到江里。但我父亲心急手快，一把抓住了邵老板的紡綢大褂，把他也拖下江去。后来，船上的狗腿子，狠狠打我父亲几棍，把邵老板救上了船。我父亲也被一家漁民救去了。因为他在江里挨狗腿子打了几棍，以后耳鼻流血，不久就死了。这时候，我母亲还不知道，她还在盼望他，以为他还活着呢！

(三)

我的姓程的父亲，是个身高膀寬的大汉，干活有一股子力气，能多挣几个工錢，可是他的飯量也大，挣的錢月月都是吃光。后来，淮河年年发大水，河两岸的庄稼全被淹光了，窑厂也不能大量生产，老板就扣着工人的工錢不发，养母只好天天带着我剝树皮、挖野菜吃。我的养父飯量大，天天树皮菜湯填不飽肚子，餓得瘦的不象个人样，我和养母也餓的风一吹就倒了。不久，我养父又得了水膨脹病，白天黑夜喘的不能說話，就这样还坚持着上工干活。后来，病重实在不能上工，就被老板解僱了。一天，老板带着狗腿子

来到我家，他瞪着一对母狗眼，恶狠狠地对父亲說：“姓程的，你被解僱啦，这房子也不摊你住了，快搬家！”母亲恳求說：“老板，你行行好吧，等孩子爹病好了，我們就搬走。”老板一听，狂吼起来：“不行！”說着，就指揮狗腿子把我家的破烂东西，統統扔了出来，然后把門鎖上走了。沒办法，养母扶着养父說：“三孩他爹，咱们趁着还能走的动，就回老家吧。回到老家死了，也比死在外乡强。”养父同意了养母的意見。

我的养身父母，老家在河南省。我們沒有路費，就沿途討飯回去了。回到老家一看，屋子倒塌了，庄田被地主霸占了。沒办法，我們就住在人家的車棚里。这时，养父的病又重了，因为沒有錢治，又沒有东西吃，不久就死了。养母只好帶着我向全村人家磕头，才求到了几个糊糊糟，把他的屍体包上埋掉。我和养母仍旧白天挨門沿戶的討飯，晚上睡在車棚里，过着苦难的日子。

一个夏季的夜晚，下着倾盆大雨，我和养母睡在車棚里，渾身都被雨水淋湿了，半夜里，只听轟隆一声巨响，車棚倒塌了，把我們都砸在底下。等我醒來的时候，养母的嗓子都哭哑了。她看我渾身都是血，头被木梁打了一个大窟窿，鮮血呼呼向外流，她紧紧抱

着我边哭边說：“三孩，你好了吗？三孩，你好了吗？”我醒过来看看养母，她身上也都是血，臉也被打烂了。

在老家，还是沒法活下去，养母又帶我向蚌埠逃荒。沒有錢买火車票，我們就偷偷地上火車，养母扒住車擋的鐵柱子，站在車挂鉤头上，我爬在悶子車的頂上。为了不讓押車警察發現，我們連头也不敢抬，整整两天一夜沒吃飯。火車开到徐州，我們終于被一个警察發現了。他一把抓住我說：“小穷鬼羔子，我非摔死你不可。”說着，他把我抱起来，用力向車下摔去。这时，幸亏一个看路的老工人把我接住，要不然，不死也跌得腿斷胳膊折。那位老工人把我救起后，养母連忙下車給磕头，他看我們可怜，給了我們些錢和饅饃，就送我們娘俩走了。

天轉地也轉，我們娘俩又轉到了蚌埠。养母仍帶着我討飯。这討飯生活，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每天不知要看多少冷顏冰色，要听多少恶言凶語。

一天，养母帶我到市郊去討飯，一家大財主正在花天酒地吃午飯。我們站在他門口，喊叫了半天，好話不知說了多少，都沒有一個人出来，出来的只是两条大花狗。我想跑又跑不动，結果腿被狗咬烂了，筋和骨头都受了伤。养母把我抱起来，眼泪都哭干

了，这时才走出来一个肥胖的大財主，站在門口呲着牙发笑。后来，我这条被狗咬伤的腿，沒有錢治疗，就殘廢了，走路还要拄着拐棍，因此，人們都喊我“三瘸子”。就这样，养母还是天天带着我討飯。我的两个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旧社会吞灭的。

(四)

夜长盼天亮，連阴盼太阳，穷人盼的是共产党。蚌埠还没有解放，我們就听人說共产党、解放军好。說毛主席领导穷人鬧翻身，解放区的农民都分到了土地。听到了这些話，我們白天黑夜都盼望着解放。結果真的盼到了。

一九四九年元月十七日，是我最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見到了太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蚌埠。我虽然腿殘廢了，可是渾身都是勁，爬也爬到街上，欢迎我們的亲人：中国人民解放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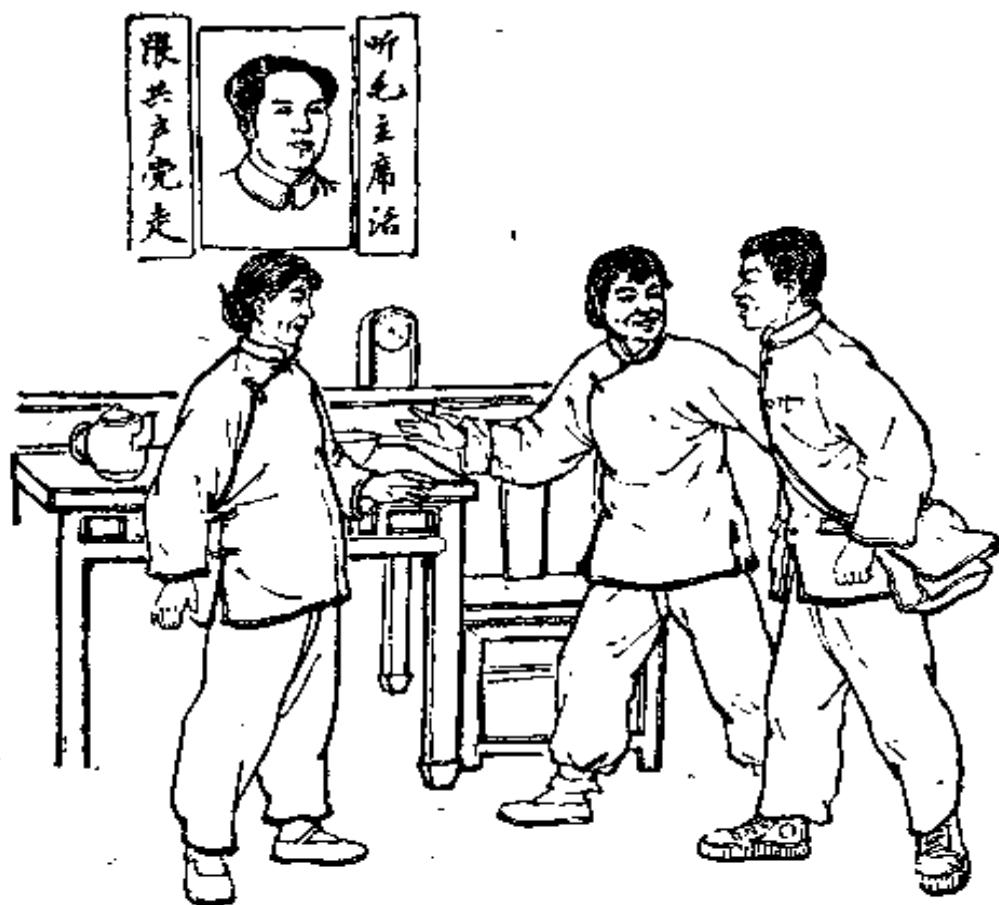
蚌埠解放了，共产党給我們找到了房子，又給养母找了工作，还免費把我殘廢的腿治好了。不久，又把我送进民办学校去讀书。当我第一次拿到新书，坐在课堂里讀书的时候，不由得欢喜地流出了感激的眼泪。

一天，我放学回家，見屋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我养母，另一个是个陌生人，当我看着发愣的时候，养母便拉着我说：“三孩，你認識她吧？她就是你的亲生母亲，快去亲亲吧！”这时我吃惊地看着母亲，母亲也流着眼泪看着我，半天才叫出一声“孩子”，我一头扎到她怀里，放声大哭起来。我的两个母亲也哭的不可开交。晚上，母亲把我搂在她怀里，和我整整談了一夜的話。她告訴我：过去那些年，她在乡下是怎样熬过来的。不久，二哥又从姓王的大奸商家跑回来了。接着，我又收到了大哥的来信。信上說：

“……我被抓壮丁以后，吃尽了国民党当官的苦头。在一次战斗中，我向人民解放军投了誠。現在，正參加‘百万雄师下江南’的战斗……”。听着大哥信里的話，我們全家人都乐得合不攏嘴来。

一九五六年，我参加了工业生产建設，来到了淮南大通煤矿干工。每当我想到过去的苦和現在的甜，干起活来就不覺得累。而我在工作中做出一点成績的时候，党和人民又給了我許多荣誉，評我为“先进生产者”、“青年突击手”……。一九五九年，党又吸收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永远难以忘記的。

現在，我大哥复員在家当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会



計，二哥當生產隊長。我們兄弟三个人都參加着工農業生產，孩子都在上学，生活过得很好。我的两个母親，也愉快地度着晚年。

（都来宾整理）

一个紡織女工的今昔

錢植之 王光林

今年三月的一天，是合肥安紡一厂織布工人張妙英的五十一岁生日。这天，張妙英象往常一样到厂里上工，在喀隆喀隆的織布机声里，看着年輕一代的織布女工們在愉快地专心操作，不禁回忆起自己在織布机旁整整四十三年的岁月变迁。

(一)

張妙英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她的父亲是上海電燈厂的銅匠，母亲在楊樹浦日本人办的大成紡織厂当織布工。他們在楊樹浦租賃了一个亭子間，里面除了一張板床、一張破桌和几条板凳以外，再沒有旁的什么了。一家几口能一天糊上两頓嘴，便是好日子。常常因为舍不得花錢买菜，一个銅板的豆腐，几个人就吃上一天。

临到張妙英八岁那年，有錢人家的父母該是要为子女盤算入学的事了，可是在穷苦的工人家庭里却已

算得半个劳动力哩！父亲和母亲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带她进紗厂当童工，将来也能有个謀生的本領。一天，媽媽翻出一件还算象样的棉衣；給父亲拿到当鋪里去当了四块銀元，就在街上买了火腿、鷄蛋、啤酒等礼物。当晚放工以后，媽媽牵了妙英，提了礼物，来到拿摩溫（即工头）王小妹家里，先送上礼品，又拉妙英上前行了礼，千恩万謝，求她帮忙弄一張进厂的折子，讓女儿到厂里当童工。拿摩溫假意客气一番，把礼收下，答应到厂里想想办法。隔了几天，果然弄来一張进厂做工的折子。做母亲的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悲伤，高兴的是总算几块錢礼物沒有白送，悲伤的是眼看着才只有桌面高的亲骨肉就要和自己一样进工厂受苦了。

这天一大早，媽媽便叫醒了妙英，帶她一道来到大成紡織厂。妙英怯生生地躲在媽媽身后，看着媽媽在門房里递了折子，走进了对她來說完全陌生而又十分新奇的工厂。媽媽把妙英領到拿摩溫面前，向她报了到，請她分配生活做。拿摩溫低下头看了妙英一眼，冷冷地說：

“你就在紡紗室做插紗子生活，好好做，不准吵，也不准跑来跑去，給东洋人看見了可不行！”

妙英惊魂未定，手还没有松开媽媽的衣服，只是

仰头傻望着。媽媽可忙不迭地在一旁替她答应，并且做样子給她看，教她怎样把紗子往鐵盤上的洞眼里插，又哄着她要听阿姨的話，不准哭鬧；关照了几句，便走进隔壁的織布車間去了。

紗室里有头十个人，大都是童工，不过年紀都比妙英大，也有一两个大人。細紗間的紗一送来，大家就蹲在地上插起来。插完一批，又来一批。有时紗接不上，張妙英常常把进厂时拿摩溫的警告忘得一干二淨，和旁的孩子一样高声嚷嚷起来，招来的便是拿摩溫的呵斥咒罵，和日本領班的責打。哪个童工的頭頂上沒有給东洋鬼子用筒管敲过呢？

紗室和織布間只隔一道門，可是这道門呵！在幼小的張妙英的心里，就象是把她和媽媽分隔在两个世界一样。媽媽曾經关照来关照去，叫她千万不要到車間里找，給拿摩溫和日本領班看到要吃排头的。只有当媽媽有时拿筒管到紗室來換領紗时，才能讓女儿見到一面。中午，媽媽把帶來的飯食裝一碗出来給妙英吃，又匆匆忙忙地回到織布車間去一边吃飯，一边看車了。一天，妙英看日本領班不在，拿摩溫也进写字間去了，便偷偷挨进織布間的門，在布机弄堂里东穿西找，寻到媽媽。这可把媽媽难坏了。她板着臉叫妙英赶快出去。当妙英站在机器旁边迟疑的时

候，冷不防一記巴掌下来，打得她昏头转向。原来那个面目猙獰的日本領班，不知什么时候已經回到車間來了。

在紡紗室干了两年，張妙英吃自家的飯，干資本家的活，一个錢的工資也沒有到手。听媽媽說，插紡子原來規定是一角錢一天，每个月都給拿摩溫揩油去了。一直到第三年調到穿筘間以後，張妙英才开始拿到一个月三塊錢的微薄工資。

到妙英十四岁的时候，母亲决定讓她學織布。在日本東托人，西求情，沒有能找到門路，后来还是車間里的姊妹替她介紹，到另外一家厚生紗厂去給拿摩溫送了一份禮，总算答應讓妙英偷偷地進廠學織布，不过这是瞞着領班，不給老板知道的。在車間里要是看到領班一來，妙英和另外几个學織布的女工，便赶紧



躲到厕所里隐藏起来，等到領班走出車間，才敢重新露面。而且，名义是叫进厂学織布，实际上也沒有專門的人来教，不过能讓你在机器旁边看看罢了，还得把拿摩溫伺候得好好的，象替她洗衣服啊，吃飯的時候替她泡飯啊，下了班給她倒揩面水啊，甚至有时还得到她家里去做些杂事哩！因为要不这样巴結奉承，是得不到上机器擋車机会的。如此几个月以后，碰上有个女工那天沒有来上工，平时又还能得到拿摩溫的喜欢，才給妙英上机做替工。开头先学擋一台，慢慢学会擋两台車、四台車了。当然，在整个两年学做織布的時間里，所有做替工应得的工資，也全部讓拿摩溫中飽去了。这样一直到十六岁，張妙英才又回到大成厂去，和媽媽一道当上一名正式的織布女工。

(二)

張妙英回到大成紡織厂当一名正式女工的經過是这样的。母亲先在拿摩溫那里把关子打通，把平时一家省吃儉用节约下来的两块銀洋交到拿摩溫手里，說了多少奉承話，請她轉送給招工先生，想法子替妙英写上个号头，弄一个工折。隔了几天，招工先生傳下話來：“明天到厂里来跑跑看。”

第二天凌晨，張妙英赶早到厂門口去听候消息。

辰光还不到五点，工厂的大門紧紧关闭着，門口已經有四五十个失业的紡織女工等候在那里了。張妙英知道她們也都是和自己一样来碰运气的，便也挨身挤进了人羣。大家用既有些妬忌又带些同情的目光互相凝視着，誰也沒有心思开口和別人講一些什么。不多久，工厂的鐵門开了，上早班的紡織工人陸續进厂了。挤在門口希望弄到号头找到工做的女工逐渐增加到一百来个了。張妙英被挤在人羣中，一陣陣汗酸味冲进她的鼻子，她感到有些头昏、恶心，可是不願意抽出身来站到后面去。只听得門里面傳出話來說，招工先生还没有到厂里来呢！大家焦急地期待着，吵嚷着，有的开始低声咒罵了。一直到七点钟过后，招工先生張阿福才来了。大家眼巴巴地等着他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都拚命向鐵門口挤去。張妙英昏昏沉沉地讓人們推拥着，只听得招工先生拉开嗓門喊：

“大家听着，不要鬧！”

人羣剎那間靜了下来，多少双眼睛盯着招工的肥油大臉和翕动的嘴巴。

“今天厂里需要細紗五人、織布八人、修布……”

“我是細紗！”

“我会織布！”

“我做……！”

沒等得及讓招工把話講完，人羣里就接連爆發出尖聲叫喊，好象誰的嗓子最大誰便能得到招工的賞識而被录用似的，因為她們大都是給招工先生送過血汗錢的啊！門警惡狠狠地揮舞着木棍，不讓人們挨近招工身旁。張妙英正和別人一樣拚着嗓子喊叫，冷不防一棍對她頭頂打來。她只覺得猛震了一下，顧不得喊痛，因為這時招工已在一個個喊叫名字了：

“顧翠珍、周巧娣、陳寶妹……”

聽到自己名字的女工們，一個個笑着擠進鐵門去了。張妙英全神貫注地聽到招工把名字喊完，竟沒有聽到叫過“張妙英”，這時才感覺到頭上疼痛難當，天旋地轉，伸手一摸，已經腫起一個包。她噙着眼淚，踉踉蹌蹌地擠出人羣，也記不清是怎樣走回家去的了。一進屋，便一头倒在床上抽噎起來。等到媽媽下班回來，知道妙英沒有喊到號頭，倒並沒感到十分意外，她告訴妙英說：“傻孩子，這招工先生的人情有輕有重，哪有一天兩天便能寫到號頭的，明天再去試試吧！”

第二天，第三天，張妙英又都扑了空。一直到第四天的早晨，招工先生总算喊到了“張妙英”的名字。張妙英也從工廠鐵門擠進去了，那個名字叫金妹的拿摩溫叫妙英試驗開車、拆布，考得合格了，才发

了一張折子給她說：

“好啦！明天起來上早班吧。”

(三)

張妙英在旧社會生过八个孩子，就被工厂开除了六次。

头一个女儿名叫腊云，是妙英和同厂修机工張金榜結婚的当年十二月出世的。自从进厂以后，她早就听人說，日本鬼子办的工厂有“三不要”的規矩，就是老的不要，生病的不要，怀孕的不要。車間里姊妹害几天病沒有来上工，或者怀了孕讓拿摩溫发觉，就給踢出厂去的例子，妙英也是經常看在眼里的。所以，当她知道自己已經怀孕时，心里便一天天恐惧起来，因为尽管那是不能塞飽肚子的一只飯碗，如今也快要保不住了。到有五六个月身孕时，肚子漸漸隆起，妙英就学着車間姊妹的样，用根粗布帶把肚子綁得紧紧的，指望蒙过拿摩溫的眼睛。可是那时正是七八月天气，身上衣裳单薄，再拖了一个月光景，便再也瞞不过人了。一天，临下工以前，拿摩溫金妹走到她擋的織布机旁，臉上微露一絲冷笑：

“妙英，你回家休息休息吧！”

“謝謝阿姨的幫忙照顧了。”妙英来不及陪着笑

臉奉承她，同时不知不覺地彎起右手臂膀想把肚子遮掩起來。

金妹向正在走來的日本領班瞟了一眼，不动声色地繼續說：“算了賬，你回去吧。折子我們收掉了！”虽然明知道迟早免不掉有被开除的一天，可是拿摩溫這句話還是象晴天霹靂一样叫她全身震动。那張折子真象是工人的命根啊！張妙英只覺得兩眼一黑，差点栽倒在織布机旁。

直到腊云出世，張妙英只好在家里閑呆着。孩子生下來沒滿月，不管有奶吃沒有奶吃，就貼錢放在人家寄養，自己勒緊褲帶，省些柴米錢，再去給拿摩溫送禮，給招工先生送禮，重新进厂。

当腊云生下来还只有七八个月的时候，“八一三”战事爆发，东洋人打进閘北，局势很紧张，工厂暂时关了門。妙英和丈夫金榜商量，准备带孩子逃难到乡下祖母家去住一陣再說。可是，一日三餐还保不住，哪里还湊得起盤纏錢呢？最后，他們决定先住到租界的难民收容所去，听人說难民收容所可以免費送难民回乡哩。

节令算是已到秋季，不过天气还是非常炎熱。男女老小，几百个难民，拥挤在被汗气和便溺的秽味籠罩着的几間矮小平房里。尽管难民們每天吃的只是茶

湯稀粥，成羣的金头蒼蠅依旧毫不留情地飞到碗边筷头上來爭食。可怜的腊云，本来已經奶水不足，瘦得只剩一把骨，哪能再受这样的惊吓和折磨呢？住到难民所沒几天，便生病发起高燒来，整早晚的哭鬧着。妙英成天把女儿抱在怀里，拍呀，抖呀，怎么也哄她不住。金榜說：“抱到医院去瞧瞧吧！”

“錢呢？”妙英哽咽着，嗓子里感到凝噎，再也抑制不住淌下了两行辛酸的眼泪。

金榜一摸袋里还剩几毛錢零票，站起身說：“先抱到附近那家‘平民医院’去試試吧。”

三脚兩步赶到医院，医生說：“先交六块錢入院費，住进来看了再說。”

“六块！”張妙英心里猛的感到一陣冰涼。

“唔。”医生的心情象一潭死水那么平靜，毫无表情地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先生，好不好先把孩子留下，讓我們回去想办法湊錢送来？”金榜站在一旁恳求着。

“不行！”医生轉臉向外喊下一个病号了。

夫妻俩无可奈何地把孩子抱回难民所。一路上，腊云先是含着母亲的奶头，昏昏迷迷睡着了，不多一会，又死命咬了一下将奶头吐出，受惊似地哭鬧着，喘息着，掙扎着。妙英心如刀割，难道真就这样眼睜睜

看着孩子等死嗎？金榜咬着牙說：“只有一个办法，‘当当’！”他从墙角边的一个破布包裹里，翻出自己一套旧棉袄褲，跨过室内杂乱縱橫的地鋪，独自往当舖走去。

一套旧棉袄褲哪里值得六块錢啊！当他走出当舖时，手里只有四块錢的紗票和一張當票。回到难民所，又向几个比較熟識的穷朋友商借，东拼西凑，数滿六块錢，再把腊云抱到那个“平民医院”去。可怜孩子这时候已經气息奄奄，沒有到得医院，半路上便在媽媽的怀里断气了。

(四)

一年以后，張妙英夫妇重又回到大成厂。

这个紡織厂里，工人劳动环境十分恶劣。張妙英所在的織布車間，最闷最热。东洋人为了少断头，多織布，即使在盛夏天气也是門窗紧閉，紋风不透。車間里整天尘埃飞揚，霧气騰騰。工人在里面操作，就象蓋在蒸籠里一样，在进車間到出車間整整十二小时劳动時間里，身上的衣服一直在汗水里泡着。妙英帶到車間去吃的一頓飯食，常常悶餒了也只好泡些开水吞下肚。吃饭就在飞花下面，工人一边开車，一边搶着三口两口把肚子塞飽。逢到星期調班，要接連做上

十八个小时才能得到休息。常常有女工在车间里晕倒了，领班、拿摩温谁也不来过问，甚至反而骂她们装死。晕倒的女工只能靠车间里的姊妹们用冷毛巾替她擦擦脸，慢慢清醒过来，还得继续做生活。有次妙英看到一个女工晕倒时头正巧撞在车子上撞破了，回家躺了几天不能来上工，领班就干脆把她的折子收掉了。

张妙英最感到耻辱而难以忍受的，要算是下班出厂前的搜身了。就在工厂的大门两旁，东洋人用木栅在左右两边拦起两条只能一人通行的巷道，工人们都叫它“搜身弄”。下班的男女工人可不能自由走出工厂大门，必须在搜身弄里挨次让门警和搜身婆抄身以后才可以出厂。冬天尤其难过，不管怎样寒气袭人，妙英她们都得先把棉衣敞开，让搜身婆冰冷的双手插进衬衣里去摸索。搜身是在东洋人一旁监视之下进行的，甚至连鞋袜也得脱出来检查一下，不肯轻易放过。

为了生存，为了自由，被压制得透不过气来的工人，终于在大成厂里掀起了仇恨的旋风。那是从一向残酷暴戾地虐待中国工人的日本领班阿堂引起的。

一天，张妙英照常去上工，发觉车间里的情况有点异样，有些姊妹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窃窃私议。

車間外面，人聲也漸漸嘈雜起來，忽然聽到有人吹口哨，接着有人在車間角落里丟出一把筒管，不知是誰在喊：

“為什麼天天打我們工人？搖板（即罷工）！”

“對，搖板！搖板！”一些女工跟着喊叫，織布機陸續停下來了。

張妙英知道一定要出什麼事情了。凭她多少年來接二連三地遭遇的不幸來講，她對老板、領班、招工、拿摩溫等等的厌恶憎恨之情，是不会比別人降低一分的。可是在此以前她却從沒想到反抗，想到鬥爭，只指望自己巴巴結結地做生活，不讓東洋領班找出岔子來，尽量多織几碼布，多掙几分工錢養家活口。不過現在看到好多人在鬧搖板，喊關車，也就迷惘地把車子停了下来。

這時候，車間里大部分女工，有的拿梭子，有的拿打梭棒，轟地一下都向外面冲去了。妙英也空着手涌在人堆里，擠出了車間。男工們已經走在她們前面，亂哄哄地奔向東洋人的寫字間。張妙英看到廠里的警衛揮着木棍，叫罵着，企圖把大家趕散，可是在憤怒的人羣面前，這幾條看門狗再也逞不出威風了。

寫字間的門關得緊緊的，幾個東洋鬼子早就象老鼠似的躲藏起來了。忽然一個男工在後面喊道：“阿

堂躲在整理間小房間里！”人們立即又象潮水一般向整理間涌去。阿堂要想夺路逃走已来不及，被怒火燃燒的工人圍在核心，这个一梭，那个一棒，竟把这个殘暴成性的东洋鬼子送回老家了。

租界里的外国巡捕房派来了警車，胡乱捉了一些人去。可是，妙英感到，被工人的斗争吓破了胆的东洋鬼子，以后也不大敢再象阿堂那样将工人隨意糟蹋了。

打死領班阿堂的事沒有隔多久，在千万人盼望中的抗战胜利的消息傳来了。張妙英滿心以为，以后工人可以过些安稳日子了。誰想国民党政府接管工厂以后，招牌是改了“中紡十四厂”，可是官僚資本家、領班、工头們压迫和剝削工人的行徑，却和日本鬼子一个样。特別在蒋介石发动內战以后，生活指數直線上升，鈔票越来越不值錢，柴米油盐一天漲几次价。工人家裡穷得揭不起鍋蓋。于是，在厂內共产党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工人們又接連掀起了反飢餓、減少勞动工时等等斗争。

張妙英在这几次斗争中逐渐觉悟并且成长起来。她由开头的旁觀者到后来的参与者，懂得了不少新的东西。从前，她只知道慨叹自己的苦难的童年，或者为夭折的儿女悲伤出涕，总認為是自己的一家命运不

好，心里想的只是多織几碼布，多掙几个工錢；而今，她开始体会到，那不光是一家一戶的苦难，更不是什么命运，里面包含着階級压迫的烙印啊！

(五)

一九四九年，大上海的解放，結束了張妙英三十年被压迫的苦难岁月。“中紡十四厂”改为“国棉九厂”，成为社会主义性質的国营企业了。从前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家压迫工人侮辱工人的各种反动制度被根本廢除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福利都逐步得到改善。特別叫張妙英感动的是：从前騎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領班、招工、拿摩溫和国民党、三青团、护工队等等牛鬼蛇神都被彻底肃清，确确实实感覺到自己不再是奴隶而开始过真正是人的生活了。自己多少年来梦想着，在不受欺凌不受侮辱的自由空气里老老实实从事劳动的願望，已經成为現實。过去，她恨工厂，一听到織布机的声音就头痛心煩；而今，她对工厂、对机器变得很有感情了。她努力劳动，积极参加政治理学习，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就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安徽支援生产建設。

旧社会的張妙英，只是一个为了个人和家庭的生存而在織布机旁掙扎卖命的普通女工罢了，可是新社

会的張妙英，已經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員，并且以老一輩紡織工人的身份，在生产中放射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光芒了。別的不提，就以她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手下的紡織厂里，过了三十年牛馬生活的亲身經歷，便是对新中国年輕一代紡織工人进行新旧对比的阶级教育的良好教材。有的年轻学员才进厂就嫌待遇低，錢不够花；有的青年女工嫌生活难做，光叫困难，張妙英知道了这些事，就常常在厂里的生产會議上、在女工集体宿舍里、在自己的家里，将旧社会紡織工人的艰苦劳动和非人生活和大家講上一段，讓大家想想，比比，看看，新社会的紡織女工到底是苦是甜。年轻的人听了張妙英講过亲身痛苦经历，有的心里慚愧，臉上发燒；有的感动得两眼潤湿，她們再也不好意思再在劳动上、生活待遇上发什么怨言了。

張妙英現在再不用为生活問題耽心害怕了，現在在她家里放着的，再不是当年的板床、破桌，代替它們的是大衣櫥、电风扇和成套的紅木家具。解放后出世的一个女儿，現在无忧无虑地上学讀書，要和她們不幸的大姊腊云比較起来，真是天上地下。从前的張妙英，为着要养家活口，不得不在資本家、領班、工头的淫威之下，埋头多織布，多掙几分工錢，如今張

妙英积极劳动的目的，已經完全冲破这个个人生活小圈子，而首先是在考慮工厂的生产任务和車間、小組的荣誉了。她現在担任生产副組长。領導同志對她說：“你年紀大了，不要看車，帶做做帮結工的活吧！”帮結工的任务是帮助擋車工處理斷头，發現了疵点就帮忙拆布，好象只是起輔助生产的作用。可是，張妙英做了帮結工却并沒有比車間里哪一個女工輕松一些。哪个女工生病休息了，哪个又到托儿所喂奶去了，她就主动上去替她們看車；哪个女工因为住的远有时来得迟了些，她就事先帮助她把車上的准备工作做好。她的年齡大，經驗多，人緣好，又肯帮助別人，再加上車間里有好些女工又是从前在她的小組里做过后来調出去的，因此好些年輕女工生产中碰到困难常来找她，簡直把她当作車間里的“生产顧問”了。这个擋車工出了一段坏布，來請她去帮忙指点；那个帮結工碰到絞头繁乱理不清头緒，又到她这里来求救。張妙英便时常因为帮助了別人，自己少做了活而少拿了超額奖金。她却以此为乐，从无怨言，更沒有把关心別人的热情減低一分。曾經有人这样問張妙英：

“老阿姨，你已經过了退休年齡，旧社会受了半輩子的苦，也該休息休息了。”

張妙英搖头笑笑回答：“那怎么行？別看我年紀

大，好些年輕人的身體還不及我硬朗哩！在舊社會我吃苦受罪，是共產黨把我們解放出來，才能過今天這樣安定幸福的生活，我能干一天，一定要為黨多做一天工作，我從來也沒想到自己要休息哩！”

張妙英的故事到此並沒有結束，那段用血和淚寫成的舊日的痛苦史，早在十四年以前便已宣告終結了，而從她的中年時代才開始的革命史和幸福史，却還在新的一頁上接連記載着更加鮮明更加生動的情節。